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 101 期（民國 107 年 9 月），63-115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國維與胡適文學革命論*

陳以愛**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新文學運動之核心觀念——「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追溯這一理論的淵源所自，指出胡適與王國維有密切的關係，從而說明從晚清到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兩代人之間，在思想上的繼受和疏離關係。本文詳細比對王國維和胡適的文學觀念，先探究王國維觀念如何受到歐洲、日本著作的影響，再考察王國維著作的流布，指出胡適在美國留學受到王氏的啓迪，發現了宋元白話文學的成就，大大提高對文學革命的信心。可是，胡適基於對上一代學人的競勝心理，卻不願公開承認王國維對他的啓迪，最終使王國維在新文化派建構的新文學系譜中，未能佔有一席之地。然而，從文學及學術的整體視野來看，王國維在歐美觀念的影響下，早已展示出現代學術的精神，且作出傑出的研究成果，得到域外學者的普遍尊重，譽之為現代中國最重要的一位學者。惟當年輕人接受的是胡適「哥白尼式革命」的精神，遠離了王國維「承先啓後」的態度，乃使「後勝於前」的高昂信心，成為這一時代文化運動的主調。

關鍵詞：王國維、胡適、文學革命、新文學系譜、現代學術

---

* 本文初稿發表於 2017 年 12 月 7-8 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轉型與流變——從晚清到五四」國際學術研討會，承潘光哲教授、趙帥先生提供寶貴意見，陳瑩、楊子葳兩弟校訂文字，兩位匿名審查人提示資料及商榷論點，謹表謝忱。其中一位審查人提示的文章：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史／考》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期 6（2015 年 12 月），頁 325-344，與本文尤有關係，請一併參考。
收稿日期：2018 年 4 月 12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8 年 11 月 16 日。

**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一、引　言

新文化運動一百週年祭，各地陸續舉辦紀念活動。此一震動中國之文學運動並帶動文學革命之新文化運動，影響至爲深遠。這一運動之主人公胡適（1891-1962），乃成百年中國最重要人物之一。雖然，針對文學革命論之源頭，胡適多次自述個人小史，後世學者也屢闡發其義，唯其中猶有待發之覆。最核心的一個問題，即胡適「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之說（文學隨時代而變遷），及其對白話文學的高度信心，到底從何而來？以何爲依據？

胡適多篇自述之最大闕漏，在其涉嫌隱沒王國維（1877-1927）對其思想的啓迪。胡適生前已有學者發現其文學觀和王國維間存在微妙關係，蔡元培、[1]吳文祺、[2]浦江清、[3]任訪秋、[4]黃濬，[5]皆發文暗示及表達質疑。然而，胡適從未公開回應這些文字。胡適逝世後，繼續發現胡、王思想交涉者，尚有蔣星煜、[6]陳平原、[7]羅志田、[8]陳鴻祥等人。[9]由此可見，王、胡文學觀的關係是新文化運動中一大課題，猶待一次全面梳理。

[1] 蔡孑民，〈《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對於胡適之先生《紅樓夢考證》之商榷〉，收入季羨林主編（下略），《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 2，頁 744-749。

[2]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合訂本（1927年 6 月），頁 759-771。

[3] 穀永（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3（1928年 6 月 11 日），第 9 版。

[4] 任訪秋，〈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原載《中法大學月刊》，卷 7 期 3，收入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頁 73-84。

[5] 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聖盦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上冊，頁 31。

[6] 蔣星煜，〈胡適與元雜劇、明清傳奇〉，《文壇藝林滄桑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頁 101-122。

[7] 陳平原，〈胡適的文學史研究〉，收入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214-259。

[8] 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55-321。

[9] 陳鴻祥，《王國維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 341-379。

值此新文學運動發生百年之際，本文認爲對王、胡學術思想異同加以辨析，有助我們更深一層理解新文學運動的本質，而不是爲了抉發胡適隱沒前輩之說的缺憾。在架構上，本文擬就兩個問題展開討論：第一，胡適到底在哪些觀念上受王國維啓發？這些啓發是核心觀念還是局部問題？第二，王國維若在一定程度上啓發了胡適，然則他未成爲文學革命領袖之原因何在？民初新文學運動和晚清前輩學人的繼承和斷裂是在哪些層面和哪些意義上？前一問題，是欲抉發胡適對王國維觀念的繼承；後一問題，則是探討和說明王、胡兩代學人的疏離。

二、一個核心觀念的形成及其思想源頭

胡適生前念及後人搜索之勞，早爲我們留下詳略不等的自述，一再敘說其文學革命的個人小史：

（1）〈《嘗試集》自序〉（1919 年 8 月 1 日）

（2）《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 年 3 月 3 日）

（3）〈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1933 年 12 月 3 日）

（4）〈《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1935 年 9 月 3 日）

（5）《胡適口述自傳》第七章〈文學革命的結胎時期〉（1957-1958 之際）[10]

上述五篇文字中，〈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是一篇具有歷史定位意義的文字。下面謹依寫作順序，說明胡適自述新文學運動誕生的關鍵時刻。

[10] 這是胡適用英文留下的紀錄，以〈逼上梁山〉爲底本，略加修訂而成。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295-314，並參考唐德剛在該章注 1 之說明，頁 314-315。

（一）自述個人「文學革命的小史」

胡適從 1917 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以後，首次自述其「文學革命」主張的形成過程，以及他爲何使用白話作詩，見 1919 年《嘗試集》之〈自序〉。他說：

> 我現在自己作序，只說我為什麼要用白話來做詩。這一段故事，可以算是《嘗試集》產生的歷史，可以算是我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11]

胡適在這篇說明「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中，提出一個關鍵時刻：1915-1916 年春。他說，在這一個時候，他開始形成一種「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

胡適自述赴美留學以後，「在綺色佳〔康奈爾大學〕五年，我雖不專治文學，但也頗讀了一些西方文學書籍，無形之中，總受了不少的影響」。[12]接著他說明：

> 那時影響我個人最大的，就是我平常所說的：「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這個觀念是我的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13]

「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是胡適文學革命的核心觀念，是無庸置疑的了。然則胡適在 1915-1916 年春之前，究竟受了甚麼具體的「影響」，從而形成這個最爲關鍵的觀念，他卻未有交代。又所謂「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其意涵到底指的甚麼，胡適也未加細述。

今檢《胡適文存》第一集，收錄有一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作於 1917 年 5 月，胡適一開篇就說明這一核心觀念的意涵：

>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14]

---

[11] 胡適，〈《嘗試集》自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79。
[12] 胡適，〈《嘗試集》自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81。
[13] 胡適，〈《嘗試集》自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84。
[14]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原載《新青年》，卷 3 號 3（1917 年 5 月），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30。

如此說來，所謂「歷史的文學觀念論」的意涵，即「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此他進一步提出，「今日之文學，當以白話文學爲正宗。」又說：白話文學的成就，「在文學史上，雖已有許多證據，……而今後之文學之果出於此與否，則猶有待於今後文學家之實地證明。」[15]

回頭來看胡適的〈《嘗試集》自序〉，他認爲「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是其「文學革命論的基本理論」，卻未交代他受了什麼「影響」形成這一觀念。只摘錄自己 1916 年 4 月 5 日所作《札記》，說明他的主張。下面直錄《札記》這段長篇文字：

> 《札記》第十冊有〔民國〕五年四月五日夜所記一段如下：
>
> 文學革命，在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即以韵文而論，三百篇變而為騷，一大革命也。又變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賦變而為無韵之駢文，古詩變而為律詩，三大革命也。詩之變而為詞，四大革命也。詞之變而為曲，為劇本，五大革命也。何獨與吾所持文學革命論而疑之？文亦遭幾許革命矣。自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可觀者。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文法遂衰。韓退之所以稱「文起八代之衰」者，其功在於恢復散文，講求文法。此一革命也。……宋人談哲理者，深悟古文之不適於用，於是語錄體興焉。語錄體者，禪門所嘗用，以俚語說理紀言。……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之小說，此體始臻極盛。……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其時之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現。倘此革命潮流（革命潮流，即天演進化之迹。自其異者言之，謂之革命；自其循序漸進之迹言之，即謂之進化可也），不遭明代八股之劫，不遭前後七子復古之劫，則吾國之文學已成俚語的文學；而吾國之語言早成為言文一致之語言，可無疑也。但丁之創意大利文學，卻叟輩之創英文學，路得

[15] 胡適，〈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31。

之創德文學，未足獨有千古矣。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於今日。……文學革命何可更緩耶？何可更緩耶！[16]

胡適引用這一長篇《札記》，是有其道理的。因為這是他形成一個「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之後，最為詳細的思想紀錄。他說自己 1916 年春就形成「歷史的文學進化觀念」，即以《札記》為里程碑。

惟胡適摘錄這篇個人《札記》之後，仍未注明他這一文學史觀點從何而來？使讀者看了之後，仍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疑惑。這個疑惑包含兩方面：第一，胡適說「文學革命，吾國史上非創見也」。卻未舉出更早提出此說的先行者是誰？第二，胡適極為推崇元代文學，聲稱「文學革命至元代而極盛」，不論詞、曲、戲本、小說，都已產生第一流白話文學，可是這些「歷史的證據」由誰提供？當然，一篇留學生的個人《札記》，不必言必有據。然而，胡適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中，把這段《札記》抄錄公布，作為「個人主張文學革命的小史」，卻對上述兩個問題仍無交代，就令人不解了。

至於胡適再一次說明個人文學革命的小史，在 1923 年。該年他應上海《申報》社之邀，撰寫《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他對這篇文字的定位，是「記載這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短歷史」。惟胡適交代這五十年來文壇近事，尤其文學革命的誕生，依然重述〈文學改良芻議〉的核心觀念，強調「歷史進化的態度」之誕生。他仿照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的筆法，表述個人功績：

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故他這一篇的要點是：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迹，故不能工也……

16　胡適，〈《嘗試集》自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84-185。

>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17]

胡適接著舉出他另一篇文字：〈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把所謂「歷史進化的態度」說得更爲詳細：

>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抄襲；其完全抄襲者，決不成為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綫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為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文學無有列為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為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獲，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為之耳。[18]

胡適這一長段論述的觀點乃至文字，幾乎全襲 1916 年 4 月 5 日夜所作《札記》。他在〈《嘗試集》序〉中已經引用此篇，如今再以此爲底稿說明文學革命論的核心觀點，提綱挈領有餘，對意欲追究觀念來源的讀者，卻不免再度失望。

（二）建構新文學的系譜

胡適大概也意識到這是一個需要彌補的缺憾。恰好 1933 年底，上海良友出版社爲紀念新文學運動十五周年，計劃出版一部結集式大書《中國新文學大系》。主事者邀胡適編輯《建設理論集》一卷，列爲《中國新文學大系》之首卷。胡適欣然允諾，爲此交出了兩篇文字，第一篇是作爲全卷開場的〈導言〉，

---

17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330。

18 胡適，《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330-331。

另一篇就是著名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新文學鉅子向來深悉「述史」的重要性，以及話語權的關鍵性。誠如胡適說的：「《新文學大系》的主編者趙家璧先生要我擔任『建設理論集』的編纂，我當然不能推辭。」[19]在寫作時序上，〈逼上梁山〉在先；在全書排序上，是〈導言〉在前。

我們不妨先看那篇〈導言〉。胡適文中詳述新文學運動的源起，再一次鄭重指出，「歷史進化的文學觀」，即「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是他文學革命論的中心思想，也是他倡導文學革命的「作戰方法」。這一次，他較前詳細地揭示思想來源：

>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文學改良芻議〉，二）
>
> 後來我在〈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裏，又詳細說明這個見解。這種思想固然是達爾文以來進化論的影響，但中國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張文學隨時代而變遷的。最早倡此說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清朝乾隆時代的詩人袁枚、趙翼也都有這種見解，大概都頗受了三袁的思想的影響。我當時不曾讀袁中郎弟兄的集子；卻很愛讀《隨園集》中討論詩的變遷的文章。[20]

胡適說他的文學見解受清人袁枚影響，有留學日記爲證。[21]此時，他更上溯源頭至「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大約是受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啓發。[22]由此，胡適提出了一個新文學系譜，遠溯明代，歷經清代，最後歸結到北大派，結成近幾十年的新文學果實。

---

19 胡適編選，〈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據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1935 年版影印，2003），頁 2。

20 胡適編選，〈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頁 19。

21 胡適《日記》1916 年 7 月條下「記袁隨園論文學」，收入《胡適全集》，卷 28，頁 395-399。他另有一篇獨立出來的〈論詩偶記〉，也約寫於此一時期。原載《留美學生季報》，冬季第 4 號，收入《胡適全集》，卷 12，頁 9-17。

22 錢鍾書爲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作了精簡概括：「本書的基本概念是：明末公安派、竟陵派的新文學運動，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趨向上和主張上，不期而合。」至於錢鍾書對周作人此說的批評，參見錢鍾書，〈書評：《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原載《新月月刊》，卷 4 期 4（1932 年 11 月），收入氏著，《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

然而，如果我們全盤接受胡適的這一新文學系譜，那就會錯過另外兩位大名鼎鼎的清代和近代學人焦循和王國維，因爲他們也用了「歷史的眼光」考察文學之變遷。而且，焦、王和胡適的思想，存在微妙的連繫。第一位明白揭出此一淵源的人，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年輕助教浦江清。1928 年 6 月 11 日浦氏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他提醒讀者注意：

> 千百年來，能以歷史的眼光論文學之得失者，二人而已。其一江都焦里堂氏，其又一則海寧王靜安先生也。焦氏之說，詳見《易餘籥錄》卷十五，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故周以前惟有三百篇，楚惟有騷，漢惟有賦，魏晉六朝惟有五言，唐惟有律絕，宋惟有詞，金元惟有曲，明惟有八股，其說通古今之變，確然不可移易，然猶有未盡者，則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也。王先生好西人叔本華之哲學，……旁及其美學及藝術論。……參斟而並觀之，遂悟歷代文學蛻變之理，拈出真不真之說，以通論古今文學之盛衰，發前人之所未發，言焦氏之所未言。[23]

按照浦江清的看法，胡適新文學主張提出以前，存在一個「焦循──〔叔本華〕──王國維」的系譜。王國維在焦循、叔本華啓發下，闡發「文學蛻變之理」，說明「一代有一代之所勝」，且較焦氏之說更爲明確。[24]然則胡適對焦循、王國維之說是否知悉？又在甚麼時候得聞其說？

今檢《胡適文存》有 1918 年 10 月 15 日在《新青年》發表的〈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述及「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之觀念，胡適確曾稱道焦循之說：

（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04-210。錢鍾書另一文俏皮地指出：「一切成功的文學革命都多少帶些復古──推倒一個古代而另擡出旁一個古代」。也是針對周書而發。參見錢鍾書，〈論復古〉，原載 1934 年 10 月 17 日《大公報》，收入前引書，頁 126。

23 轂永（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3，第 9 版。

24 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史／考》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期 6，頁 331。

人類生活隨時代變遷，故文學也隨時代變遷，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學。……（古人如袁枚、焦循，多有能懂得此理的。）[25]

胡適在此把「袁枚、焦循」並列，何以到了《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中，焦循忽然不見蹤影了？

再檢《胡適日記》1922 年 9 月 9 日條下，也反映了他對「焦循──王國維」系譜確有認識：

買得上海新印出的《曲苑》一部，內有……焦循《劇說》六卷，是我久想看的，今天總算見着了。焦氏此書是〔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先聲，搜的材料很有可以寶貴的。[26]

胡適的日記，充分說明他對「焦循──王國維」這一系譜，不僅理解，而且高度重視。

倘若翻閱胡適如此重視的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一書，其開篇小序第一句話，明白揭出王氏文學觀：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27]

該書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則稱引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之說：

元雜劇之為一代之絕作，元人未之知也。明之文人，始激賞之。至有以關漢卿比司馬子長者。（韓文靖邦奇）三百年來，學者文人，大抵屏元劇不觀。其見元劇者，無不加以傾倒。如焦里堂《易餘籥錄》之說，可謂具眼矣。焦氏謂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為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28]

25 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原載《新青年》，卷 5 號 4（1918 年 10 月），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39。

26 胡適，《日記》，1922 年 9 月 9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29，頁 745。

27 王國維，〈序〉，《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據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5 年版複製，2014），頁 1。

28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0。

王氏《宋元戲曲史》這一段敘述，集中闡發了焦循、王國維的文學蛻變論，即是胡適所謂焦氏之說爲王氏先聲的依據。然而，胡適「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之理論，既有焦、王發表在前，胡適又極清楚兩氏論調，何以在胡適建構的新文學系譜中，他們卻不能佔有一席之地？

戲曲史研究者蔣星煜在〈胡適與元雜劇、明清傳奇〉一文中，嘗比較王國維、胡適論戲曲之文，尖銳批評：

>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論點，王國維持之甚力，胡適也據以立論發揮，他們都淵源於焦循。不過，他們都不太願意承認這一點，都有一定的掠美嫌疑而已。[29]

然而，據前引王氏《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王國維明白稱道焦氏之說，未曾掠美。至於胡適是否「據」王國維之說而「立論發揮」，則猶待進一步考察。

再看胡適那篇流傳最廣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是胡適欲爲自己作歷史定位之作，用心撰寫自不必說。此文 1933 年 12 月 3 日脫稿後，刊《東方雜誌》第 31 卷 1 號（1934 年 1 月 1 日），又列爲《四十自述》末章。[30] 流布最廣，影響最大。後來胡適在美國作《口述自傳》，也是據此作爲底本，留下一個英文版本。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強調這篇小史的珍貴性與可靠性：

> 〈逼上梁山〉一篇是要用我保存的一些史料來記載一個思想產生的歷史。……是許多個別的，個人傳記所獨有的原因合攏來烘逼出來的。[31]

這是胡適明白告訴讀者：此文具有歷史證據的作用，是一份可靠的個人敘述。我們可以說，這是胡適欲爲文學革命論提供一個流傳後世的自定版。唯其如此，更應格外審愼地閱讀。正如胡適那時針對陳獨秀的經濟史觀，奉勸讀者：「治歷史的人，應該向這種傳記材料裏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32]同

---

29 蔣星煜，〈胡適與元雜劇、明清傳奇〉，《文壇藝林滄桑錄》，頁 121。

30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之附記，收入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頁 27。

31 胡適編選，〈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頁 17。

32 胡適編選，〈導言〉，《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頁 17。

樣的，今天對胡適提供的敘述，也須要向傳記材料去尋求「那多元的，個別的因素」。

首先，詳按胡適本人在〈逼上梁山〉的敘述，還是很有必要的。相較已經發表的幾篇文字而言，〈逼上梁山〉爲文學革命添上一段情節，把 1916 年 4 月胡適寫下「文學革命」的《札記》之背景，補上一段前所未有的說明：

> 從〔1916 年〕二月到三月，我的思想上起了一個根本的新覺悟。我曾徹底想過：一部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隨時起來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歐洲各國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33]

胡適緊接著的一段文字，則透露此一「根本的新覺悟」之形成，與胡適對宋元明文學的新認識至有關係：

> 我到此時纔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纔認清了中國俗話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34]

1916 年 4 月 5 日夜裡，胡適寫下了他對元代白話文學的推崇：

> 總之，文學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極。其時，詞也，曲也，劇本也，小說也，皆第一流之文學，而皆以俚語為之。其時吾國真可謂有一種「活文學」出世。……惜乎五百餘年來，半死之古文，半死之詩詞，復奪此「活文學」之席，而「半死文學」遂苟延殘喘，以至于今日。……文學革命何可緩耶？何可緩耶？（四月五夜記）[35]

這樣看來，認定元代已產生「第一流之文字，而皆以俚語爲之」，在提升胡適對白話文學的高昂信心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

33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收入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頁 9-10。

34 胡適，《四十自述》，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108-109。

35 胡適，《日記》，1916 年 4 月 5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28，頁 337。

胡適日記 1916 年夏天的記載，可以證實他的上述說法。其 7 月 6 日條下，記胡適與留美學生任鴻雋、唐鉞、楊杏佛，討論中國文學改良問題。胡適信心滿滿爲白話文學辯護，理由是從中國文學史看來，「白話可以產生第一流文學」。[36]他說「白話已產生小說，戲劇，語錄，詩詞，此四者皆有史事可證」。[37]我們不可輕忽「有史事可證」的重要性。誠如胡適所說，對歷史觀念濃厚的中國人而言，唯有元人在小說、戲劇上的具體成就，始能提升人們的信心。胡適這一番話，無疑是夫子自道。據胡適說，1916 年 3-4 月是他思想上的分水嶺：

> 我覺得我已從中國文學演變的歷史上尋得了中國文學問題的解決方案。[38]

胡適多年後作《口述自傳》，不忘強調「由歷史分析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尤令胡適振奮的，是他的主要反對者梅光迪，在 1916 年 3 月 19 日復函中，居然對他的新主張表示贊同：

> 來書論宋元文學，甚啟聾聵。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無待言。[39]

梅光迪這位最大論敵的反應，的確令胡適信心倍增。4 月 5 日的那篇札記，即是這一見解的歷史紀錄。

極爲遺憾的是，1916 年 3 月間胡適致梅光迪的那篇長函，居然不獲保存。今天只看到梅光迪 3 月 19 日的回函。不過，胡適總算在《口述自傳》告訴我們：那封致梅光迪信上指出，宋人已用白話發展出語錄體，元人更用白話編寫戲劇、短篇和長篇小說，而其成果斐然：

---

36 胡適，《四十自述》，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113。胡適在 1930 年代寫《四十自序》的〈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時，又把上述見解納入其中。

37 胡適，《四十自述》，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113。

38 胡適，《四十自述》，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111。

39 胡適，〈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收入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頁 10。

所以我指出這種用語體文寫的活文學——最明顯的如元曲——便是人民大眾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文學革命的最高潮。[40]

他再一次高興的提到，當年梅光迪的回應給予他莫大信心：

出乎我意料之外，我這項由歷史分析出發所得出的結論，竟為我那在哈佛大學的保守朋友梅光迪，所欣然接受了。

所以在一九一六年的春季，我就寫一些比較完備的有關我對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和大綱。[41]

如此說來，宋元白話文學的高度成就，對胡適建構其文學史觀點有重大影響。然而，胡適是如何獲得他對元曲和小說的新認識？卻未交代一語。

總括來說，胡適自述個人文學革命論的形成，有兩個關鍵點，恰恰都給後人留下了疑竇：第一，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之中心理論，從何而來？二，1916 年春，胡適對元代白話文學的新認識，又從何而來？

三、胡適早年著作中王國維的身影

王國維著作的流布

爲胡適撰寫《舍我其誰》大傳的江勇振感嘆：「胡適對他自己思想形成的軌跡，一向不會吝於留下至少是片語隻字的痕跡。唯一例外的是有關他一生思想關鍵的轉捩點。我們可以說這是他不老實的地方，但我更寧願相信這是他給後世想爲他立傳的歷史家所下的一個挑戰。」[42]如果我們把胡適未提王國維著作對他的啓發，當作他留給後世挑戰的話，那麼本文考證胡適在上海和留美時期讀過的王國維著作，可能包含了下列數種：[43]

---

40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301。

41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301-302。

42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頁 327。

43 參考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匯與王國維學術成就》（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附錄：王國維著述年表〉，頁 382-482。

（1） 《紅樓夢評論》，刊《教育世界》，第 76-81 號（1904 年 6 月-1904 年 8 月），收《靜庵文集》（1915）。

（2） 《人間詞話》，刊《國粹學報》，第 47、49-50 期（1908 年 11 月、1909 年 1 月-1909 年 2 月）。

（3） 《戲曲考原》，刊《國粹學報》，第 48、50 期（1908 年 12 月、1909 年 2 月）。

（4） 《宋大曲考》，刊《國粹學報》，第 63-68 期（1910 年 2 月-1910 年 7 月）。

（5） 《錄曲餘談》，刊《國粹學報》，第 67-69 期（1910 年 6-8 月）。

（6） 《宋元戲曲史》，刊《東方雜誌》，第 9 卷第 10-11 號、第 10 卷第 3-6、8-9 號（1913 年 4 月-1914 年 3 月），191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文藝叢刻甲集」出單行本。

（7） 《壬癸集》，1913 年出單行本，刊《國學叢刊》，第 1 卷（1914 年 6-7 月）。

在此須要先說明幾點：（一）上述諸文排序是王國維諸作刊行的次第，和胡適閱讀王作的順序不必然一致。（二）胡適 1904-1910 年在上海，1910-1917 年夏在美國，他接觸和閱讀王國維諸作的機會，不能不受限於書報流通的範圍。而王國維諸作發表的刊物中，應以《東方雜誌》流布最廣。《國粹學報》則是胡適定期閱讀之刊物，今檢胡適留學日記和書信等，都證實了這一點。在此提出兩個證據：第一處，在 1911 年 2 月 28 日胡適日記：「讀《國粹學報》三冊。」[44]第二處，在梅光迪〈致胡適信四十六通〉第三、十六、十八函，皆提到《國粹學報》館印行的期刊及叢書，進而討論相關內容。[45]至於《教育世界》，流通未廣。《國學叢刊》印於日本，印數寡少。不過，下面將指出，王

44 胡適，《日記》，1911 年 2 月 28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27，頁 117。

45 梅光迪，〈致胡適信四十六通〉，收入羅崗、陳春艷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頁 111-182。這些信函多都未考定日期，排序也偶有錯誤。例如從內容判斷，第十六函應置於第三函前。

國維在日本發表的詩作（載《國學叢刊》和《壬癸集》），胡適在美國竟有引用。由此可見，胡適對王國維著作的留意程度，以及王作遠播美國的情形。

下面依照胡適可能閱讀王國維著作的先後次第，略加考證及說明兩人作品之關係。更重要的是，進一步探討這些著作對胡適帶來的影響。

1. 《紅樓夢評論》（1904）

王國維對戲曲小說的重視，不始於《宋元戲曲史》。在 1904 年 4 至 7 月發表的《紅樓夢評論》中，他已有系統論述，認爲：

> 美術中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46]

王氏此說，是受了西洋文學影響。即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指出：

> 〔先生〕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47]

晚清以來，王國維對「詩歌、戲曲、小說」的推崇，對「悲劇」的重視，都是受西人美學、文學觀點啓發的結果。新文學年輕一代的傅斯年，嘗說王國維「治哲學，通外國語，平日論文，時有達旨」。[48]大致概括了王氏用嶄新眼光治戲曲、小說的原因。

論者多已指出，王國維以西方文學史爲參照，爲戲曲爭取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49]就具體狀況說，王國維對西方文學理論的接觸，大致通過兩個途徑而來：第一，間接受日本學人之影響。第二，直接受歐人著作之啓迪。近年眾多研究成果表明，在王國維治戲曲小說以前，明治時代（1868-1912）日本東西兩京學者對俗文學的重視，已蔚然成風。黃仕忠總括指出：「今天我們在高度

---

46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收入氏著，《靜庵文集》，現引自謝維揚、房鑫亮主編（下略），《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卷 1，頁 59。

47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陳美延編（下略），《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247。

48 傅斯年，〈出版界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原載《新潮》，卷 1 號 1（1919 年 1 月），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卷 1，頁 113。

49 對此論者甚眾，最新紮實的研究成果，可參考黃仕忠，〈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再評價〉，《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期 16（2010 年 12 月），頁 251-264。

評價王國維、狩野直喜等人的戲曲研究成果時，不能忘記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臨風等人的開創功績。」[50]的確，森槐南的〈紅樓夢評論〉（1892），藤田豐八策劃的《中國文學大綱》，笹川種郎的《支那小說戲曲小史》（1897）和《支那文學史》（1898，《帝國百科全書》第 9 編），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1903，增訂本 1907），宮崎繁吉的《中國近世文學史》等，均已重視戲曲小說。[51]這些日人著作影響了王國維的哪些觀點，猶待詳考。例如：森槐南〈紅樓夢評論〉一文，是日本紅學奠基之作。[52]王國維《紅樓夢評論》1904 年 4 月初刊，與森槐南篇名相同，卻別出蹊徑，用叔本華悲劇論詮釋《紅樓夢》。[53]無論如何，王國維和日本學者的密切交流，確實使他得風氣之先，成爲那一代中國學人中最早「預流」，以新觀念治戲曲小說的先行者。

可是另一方面，王國維也直接受歐人著作啓發，並非完全假手日人而來。他採亞里斯多德、席勒、康德、叔本華、尼采之說，以新眼光詮釋中國文學，對此論者已多。惟英人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1901 年在倫敦出版《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對王國維的影響，至今似猶未有論及者。翟里斯自翊是書爲舉世第一部中國文學史，對日本新出著作看來一無所悉。其書分三章論元代文學：詩、戲曲、小說。戲曲方面，介紹了《趙氏孤兒》、王實甫《西廂記》。翟里斯說，就目前有限的知識而言，尚難考證中國戲曲之源頭及流變，這或許催生了王國維《戲曲考原》，以及那部集大成的

---

50 黃仕忠，〈從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臨風到王國維——日本明治時期（1869-1912）的中國戲曲研究考察〉，《戲劇研究》，期 4（2009 年 7 月），頁 190。

51 近年中文世界有不少研究成果，大大推進了中、日文學關係史的認識。可參考張眞，〈平生風義兼師友——王國維曲學研究與日本漢學關係考論〉，《戲曲研究》，輯 100（2017 年 1 月），頁 4-28；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序章〉、第一編，頁 1-136；段江麗，〈日本「中國文學史」中的《紅樓夢》（一）——以笹川種郎爲中心〉，《紅樓夢學刊》，輯 6（2013 年 11 月），頁 226-240；黃仕忠，〈從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臨風到王國維——日本明治時期（1869-1912）的中國戲曲研究考察〉，《戲劇研究》，期 4，頁 155-194；黃仕忠，〈前言〉，收入黃仕忠、金文京、喬秀岩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輯 1，頁 1-45。

52 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 17-34。

53 王國維用叔本華之說詮釋《紅樓夢》的是非得失，可參考錢鍾書的評論。錢鍾書，《錢鍾書集：談藝錄（補訂重排本）》（北京：三聯書店，2001），第三則〈王靜安詩〉之〈補訂〉，頁 84-87。

《宋元戲曲史》。至於翟里斯批評中國戲曲在結構、主題上顯得幼稚，缺乏悲劇意識，也可能給予王國維刺激。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史》中，特別重視「悲劇」意識，或者淵源於此。小說方面，翟里斯認爲《紅樓夢》是中國小說最高峰，惜乎作者不詳。[54]這些論調，在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獲得迴響。另外，法國漢學家高第（Henri Cordier）主編的《中國書目》第三冊（*Bibliotheca Sinica, Volume Ⅲ, 1906-1907*），可能是另一個啓迪來源。王國維在〈〔西村天囚〕譯本《琵琶記》序〉（1913）和《宋元戲曲史》（1913-1914）中，提及歐人所譯元曲北劇，即據此書所錄作品說明。[55]王國維說：「近二百年來，瀛海大通，歐洲之人講求我國故者亦夥矣，……如戲曲之作，于我國文學中爲最晚，而其流傳於他國者也則頗早。……訖于今，元劇之有譯本者幾居三之一焉。」[56]可見歐洲漢學界對中國戲曲的重視，對他有所觸動。

近年研究者考察京都大學狩野直喜的西學來源，開始注意到一個可資比較的現象。即狩野直喜的《中國戲曲小說史》（約成於 1916-1918 年，1992 年始正式出版）及講學中，「頻繁引用法國科爾迪耶（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漢籍解題》（*Bibliotheca Sinica, 1878-1895*），英國翟里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的《中國文學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西方漢學著作，與他在上海留學期間的經歷有直接的關係。」[57]無獨有偶，狩野直喜重視引用的兩部著作，也是王國維參考的書籍。張真推想狩野 1902 年到上海留學期間，獲得直接接觸歐洲漢學平台的機會。王國維較狩野更早在上海、北京寓居，接觸西洋漢學的機會不會比狩野少。更何況他在北京時任學部圖書

54 Herbert A. Gile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pp. 247-287, 387-384.

55 王國維，〈譯本《琵琶記》序〉（1913），收入氏著，《靜庵文集續編》，現引自《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133；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88。

56 王國維，〈譯本《琵琶記》序〉，引自《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133。

57 張真，〈譯者的話〉，收入狩野直喜著、張真譯，《中國小說戲曲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頁 22。

館編輯，也得以先睹歐美日本書籍及漢學書目。至於與名流傳增湘、董康的交往，[58]也擴大了眼界。

反觀胡適留美之際，他對歐洲和日本漢學界的動向，似頗爲隔閡。故此，他對《紅樓夢》的重視，或從王國維著作而來。現在要追問的是：胡適何時得見王氏《紅樓夢評論》？王國維對《紅樓夢》的看法，又對他帶來怎樣的影響？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一文，推想胡適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在留美以前。[59]但王國維嘗說，上海《教育世界》雜誌「當日不行於世，故鮮知之者」。[60]至於收錄《紅樓夢評論》的《靜安文集》，出版後旋被禁。張蔭麟於王氏歿後作〈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便曾感嘆：「此書之出，影響極微。當時碩彥，絕無稱道。至今世人猶罕知有其書。」[61]故此，胡適在上海不一定注意到《紅樓夢評論》。茲檢《胡適藏書目錄》第 3956 號爲「《靜庵文集》一卷，王國維著，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鉛印本」。[62]未悉是何年所購，不一定買於出國前。

惟有一個直接的證據，說明胡適可能出國前未留意《紅樓夢評論》，是他寫於清末的一篇〈小說發達史〉殘稿。這篇〈小說發達史〉殘稿，是黃山書社《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收錄的未刊殘文，題爲〈藏暉室小說新語：內篇（舊小說之部）〉。細按殘稿內容，可知是胡適欲撰〈小說發達史〉的小序，以及小說第一期歷史（未完成）。《胡適全集》編者認爲，此稿「當屬留美期間的札記，姑置於 1914 年」。[63]但殘稿有「本朝」云云，推斷應寫於清亡以前。

---

58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 346-347。董康一度遊歐，對歐人熱衷戲劇留下深刻印象。董康著，傅杰點校，《書舶庸譚》（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59 羅志田，〈文學的失語：整理國故與文學研究的考據化〉，《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頁 292。

60 王國維，〈書辜氏湯生英譯《中庸》後〉之〈附記〉，《靜安文集續編》，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83。

61 素癡（張蔭麟），〈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2（1928 年 6 月 4 日），第 9 版。

62 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冊 2，頁 1326。

63 胡適，〈藏暉室小說新語：內篇（舊小說之部）〉，收入《胡適全集》，卷 12，頁 5。

且殘稿強調小說的功用，非重視小說作爲白話文學的成就，頗染晚清氣息。因此，推測此稿作於出國前或留美初期，大約 1910-1911 年。當時胡適以爲，《水滸傳》、《西游記》是元代文學，推崇施耐庵爲「小說界之大偉人」。[64]對《紅樓夢》一書，未著一語。

後來胡適寫於 1916 年 7 月的〈論詩偶記〉，才提及曹雪芹之名，評價頗高。這時候他認爲「施耐庵、曹雪芹諸人既已實地證明白話之爲小說之利器矣。今尚待吾輩以實地試驗，證明白話之可否爲韻文之利器耳。」[65]他以施耐庵和曹雪芹並列，頗疑此時已見《靜庵文集》，也參考過《紅樓夢評論》。即或不然，返國後，至遲在他寫〈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以前，他已得見《紅樓夢評論》。其〈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一文中，對中國人缺乏悲劇意識，頗加撻伐。認爲「中國文學最缺乏的是悲劇的觀念。無論是小說，是戲劇，總是一個美滿的團圓。……有一兩個例外的文學家，要想打破這種團圓的迷信，如《石頭記》的林黛玉不與賈寶玉團圓，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與李香君團圓。」[66]所言與王國維十分相似。不過，胡適的措辭激烈多了。他痛斥中國文學以團圓結局者，是「說謊作僞，思想淺薄的文學」。[67]這一種論調，卻爲王國維筆下所無。

2. 《宋元戲曲史》（1913-1914）

至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首刊《東方雜誌》第 9 卷第 10-11 號、第 10 卷第 3-6、8-9 號（1913 年 4 月-1914 年 3 月），1915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單行本。《宋元戲曲史》較《紅樓夢評論》刊布較晚，對胡適卻有更大影響。就胡氏文學觀念的形成而言，更起關鍵性的作用。

64 胡適，〈藏暉室小說新語：內篇（舊小說之部）〉，收入《胡適全集》，卷 12，頁 5-8。
65 胡適，〈論詩偶記〉，收入《胡適全集》，卷 12，頁 15。
66 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45。
67 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47。

今按胡適發表的文字，首次明白提及《宋元戲曲史》一書，在 1918 年初發表的〈歸國雜感〉。胡適文中自述前一年（1917）夏天，自美歸國，觀察上海幾年來的出版品，極爲失望。卻認爲：

文學書內，只有一部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是很好的。[68]

這是胡適第一次公開稱引王國維著作，而且留下正面評價。不過，尋按胡適留下的文字紀錄，可知在 1913 年，至遲 1914 年秋，胡適還在美國之際，《宋元戲曲史》就進入他的視野了。

在此稍微再說明一下《宋元戲曲史》的刊布和流通情形，或許是有必要的。王國維撰成《宋元戲曲考》，在 1913 年初。同年，此書以《宋元戲曲史》之名，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東方雜誌》第 9 卷第 10、11 號，第 10 卷第 3、4、5、6、8、9 號連載（1913 年 4 月-1914 年 3 月）。1915 年 9 月，《宋元戲曲史》復由商務印書館以「文藝叢刻甲集」印行。[69]就商務印書館發行網絡而言，胡適有可能在 1914-1916 年間，先閱讀《東方雜誌》本，之後又購得單行本。[70]此外，《宋元戲曲史》小序中，王國維提及此前他已完成了「《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劇腳色考》一卷，《曲調源流表》一卷。」[71]《戲曲考原》、《優語錄》，皆刊《國粹學報》（1909）。胡適作爲《國粹學報》的讀者，對王國維不會陌生。不過，王氏對宋元戲曲之作的論述，仍以《宋元戲曲史》最爲系統完整。它得到讀者普遍重視，絕非偶然。

今日得知胡適在美國得見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直接證據，保留在胡適日記 1914 年 9 月 13 日條下。過去已有學人（如羅志田）引用此條，認爲反映了王國維對胡適文學革命論有一定影響，卻未注意到此一影響其實直接來自

68 胡適，〈歸國雜感〉，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592-593。

69 參考王國維撰、馬美信疏證，《宋元戲曲史疏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頁 1。房鑫亮、李朝遠點校，程毅中復校，《宋元戲曲史》之編者說明，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3，無頁數。

70 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錄》第 1874 號即此本，冊 1，頁 362。

71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

《宋元戲曲史》。按照胡適日記的敘述，這年秋天他去波士頓圖書館搜尋歐洲人翻譯的元人雜劇，然後他在日記中留下紀錄：

> 余三至圖書館，得見法人 M. Bazin Ainé 所譯元人雜劇四本：一、《㑳梅香》鄭德輝（光祖）著，二、《合汗衫》張國賓著，三、《貨郎旦》無名氏著，四、《竇娥冤》關漢卿著。此諸劇皆據《元曲選》譯。拔殘（王國維譯名）所譯元曲凡十餘種，惜不及盡見之。譯元曲者，拔殘之外，尚有 Du Halde 譯《趙氏孤兒》（1763）；Stanislas Julien 譯甚多；英人 Sir John Francis Davis 亦譯《老生兒》、《漢宮秋》二曲。元人著劇之多，真令人嘆服。關漢卿著六十種，高文秀三十二種，何讓西人乎？元曲之前無古人，有以哉！[72]

胡適上述文字提到王國維時雖只簡略兩句話：「拔殘（王國維譯名）所譯元曲凡十餘種，惜不及盡見之。」但這句簡略的記載，卻透露出一個最爲直接的證據，說明胡適讀過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且依據王書，到圖書館尋訪元曲譯本。

因爲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第十六章「餘論」最末，專門介紹元曲譯本。他提及法文譯者 M. Bazin Ainé「所譯尤多」，用了「拔殘」之譯名。茲錄王氏這段文字：

> 至我國戲曲之譯為外國文字也，為時頗早。如《趙氏孤兒》，則法人赫爾特 Du Halde 實譯於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 Julia[e]n 又重譯之。又英人大維斯 Davis 之譯《老生兒》在千八百十七年，其譯《漢宮秋》在千八百二十九年。又裘利安所譯，尚有《灰闌記》、《連環記》、《看錢奴》，均在千八百三四十年間。而拔殘 Bazin 氏所譯尤多，如《金錢記》、《鴛鴦被》、《賺蒯通》、《合汗衫》、《來生債》、《薛仁貴》、《鐵拐李》、《秋胡戲妻》、《倩女離魂》、《黃梁夢》、《昊天塔》、《忍〔忍〕字記》、《竇娥冤》、

[72] 胡適，《日記》，1914 年 9 月 13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27，頁 510。

> 《貨郎旦》，皆其所譯也。此種譯書，皆據《元曲選》；而《元曲選》百種中，譯成外國文者，已達三十種矣。[73]

法人 M. Bazin Ainé 之譯名，在王國維稍早的〈譯本《琵琶記》序〉中，一度譯爲「拔善」。[74]撰寫《宋元戲曲史》時，王國維才用「拔殘」譯名。今據胡適日記，可知那天他在圖書館其實只見拔殘「所譯元人雜劇四本」，此即 1838 年 M. Bazin Ainé 出版的《中國元代戲曲選》（*Théâtre Chinois, ou Choix de pièces de théâtre composées sous les Empereurs Mongols*）。胡適日記說拔殘「所譯元曲凡十餘種」，指的是王國維書抄錄的十三種譯著。因此，那天胡適不啻是依王國維指示，到圖書館「按圖索驥」尋訪譯本。

1914 年 9 月，即胡適興奮地發現元曲譯本後兩個月，胡適日記又留下閱讀白仁甫《漢宮秋》的感想。胡適日記 1914 年 11 月 14 日條下：

> 讀英人大衛氏（Sir John Francis Davis）所譯元劇《漢宮秋》。此書原本余未之見，乃先讀譯本，真所謂隔靴搔癢者也。此劇是完全哀劇。即以譯本論，其布局殊得劇家神意。[75]

胡適當日所讀的《漢宮秋》，應即英人 John Francis Davis 的 *The Sorrows of Han: A Chinese Tragedy*（1829 年出版）。看來 1914 年 9 月至 11 月之間，胡適持續沉浸在發現和閱讀元人戲劇的興奮之中。他遺憾自己「先讀譯本」，不啻「隔靴搔癢」；這和王國維自道「訖於今，元劇之有譯本者幾居三之一」，至今「未讀其譯書」，適好相反。

然則王國維既未讀過元劇譯本，他的相關譯本知識從何而來？是從日人抑西洋漢學家著作而來？答案是：應直接從法國漢學家高第《中國書目》第三冊而來。而且，由於王國維不諳法文，抄寫上偶有不慎，使他發生了兩個失誤：第一、抄錄拔殘譯本時，漏掉了三種作品：《傷梅香》、《悞人〔入〕桃源》、

7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87-188。

74 王國維〈譯本《琵琶記》序〉，引自《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133。《靜庵文集續編》一書，胡適在美似尚未見。

75 胡適，《日記》，1914 年 11 月 14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27，頁 559。

《抱粧盒》。第二、誤以爲首譯《趙氏孤兒》的人，是主編《中國通志》的赫爾德（Du Halde），其實是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同時，他誤以《趙氏孤兒》法譯本出版日期爲 1762 年，其實應是 1735 年。[76]相較之下，日本京都大學狩野直喜兼通英法文字，故其「中國戲曲史」講義（1917 年 9 月至 1918 年 6 月）據「法國科爾迪耶〔Henri Cordier〕所著之《漢籍解題》〔*Biliotheca Sinica*〕」，正確指出馬若瑟才是首譯《趙氏孤兒》的法國耶穌會士。[77]而胡適沿用王國維之誤，又把「一七六二」誤成「一七六三」年，可謂一誤再誤。[78]

至於胡適，他在 1914 年秋冬之際查訪元劇譯本之際，渾然不察王國維的失誤，可知他對元曲譯本的認識，尚無其他知識來源。就是在這樣的閱讀印象下，胡適對元人文學成就有了空前信心。1917 年 1 月號《新青年》刊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大大推崇元人戲曲、小說，作爲提倡白話文學的憑據，指稱：

> 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游》、《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勝計。（關漢卿諸人，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吾國文人著作之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無可疑也。[79]

到 1919 年，胡適出版《嘗試集》時，仍高度肯定元人戲曲、小說的成就。[80]直至 1920 年，才對元人文學的評價出現較大轉折，這標誌著他開始走出王國維觀點的籠罩。

---

[76] Henri Cordier, *Bibliotheca Sinica, Volume Ⅲ*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6-1907), pp. 1784-1790.

[77] 狩野直喜著，張眞譯，《中國小說戲曲史》，頁 137。

[78] 中文世界最早指出王國維失誤的，應是芝加哥大學畢業的陳受頤。參考陳受頤，〈十八世紀歐洲文學裡的《趙氏孤兒》〉，《嶺南學報》，卷 1 期 1（1929 年 12 月），頁 118-119。

[79]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原載《新青年》，卷 2 號 5（1917 年 1 月），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4。

[80] 胡適，〈《嘗試集》自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84-185。

當日胡適認爲「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爲最盛」之論，不但指數量而言，也包含對文學成就的評價。元人有悲劇，是他特別激賞的一點，而這在《宋元戲曲史》中已有闡述。《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評《漢宮秋》、《梧桐雨》等作，認爲皆是「悲劇」，評價很高：

> 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冤》、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劇中雖有惡人交搆其間，而其蹈湯赴火者，仍出於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81]

此前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早已提出：「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劇，沈雄悲壯，爲元曲冠冕。」[82]《人間詞話》刊於 1908 年，流傳廣泛。胡適閱讀《人間詞話》當不甚晚，下面當再詳討。

但胡適受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影響的地方，尚不止如此。試看《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對照胡適 1915 年 4 月長篇《札記》，可知王國維對元人雜劇的評論，即是胡適認識元人文學的來源。王氏說：

> 元曲之佳處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真摯之理與秀傑之氣，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為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
>
> 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佈置結搆〔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寧較後世之傳奇，有優無劣也。
>
> 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搆〔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

---

[81]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1。
[82]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80。

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出其口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明以後其思想結搆〔構〕儘有勝於前人者，唯意境則為元人所獨擅。[83]

王國維這幾段評論元劇的話，傅斯年 1919 年 1 月發表〈出版界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新潮》），認爲「皆極精之言，且具世界眼光者也」。[84] 傅氏此論是否得到胡適提點，今不得而知。惟胡適在美國初讀此書時，卻開啓了他對元人文學的新認識。

必須指出的是，《宋元戲曲史》第十二章末尾，指出元人用俗語入曲，以新文體使用新語言，開創新的成就。王國維讚賞這種通俗文學：

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負於此者，實不少也。[85]

王國維肯定元人以白話入曲所達到的成就，增強了胡適對白話文學的信心，在〈文學改良芻議〉中，大膽提倡「不避俗字俗語」。

總之，對比王、胡兩氏觀點，可發現胡適對元人文學的認識，對白話文學的信心，都建立在王國維的研究成果上。即使王國維書不是提高胡適認識元人文學的唯一著作，至少也是很重要的著作。1916 年夏，胡適甚至試用白話寫曲。1916 年 7 月 26 日他致友人任鴻雋函說：

8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0-142。

84　傅斯年，〈出版界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卷 1，頁 113。

85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5-147。

> 白話入詩，古人用之者多矣。……至於詞曲，則尤舉不勝舉。……至於曲，則適在綺時，曾寫《琵琶記》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勝數（適此次作白話長詩，其得力處都在雜劇）。[86]

這一段自述值得重視，這是胡適欣賞元人曲作以後，試用白話創作韵文的紀錄。《宋元戲曲史》對他的影響，可謂大矣。

3. 《人間詞話》（1908-1909）

當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發表以前，《人間詞話》已在《國粹學報》刊出。胡適作爲《國粹學報》的忠實讀者，出國前很可能就注意到第 47、49-50 期（1908 年 10 月、1908 年 12 月-1909 年 1 月）刊出的《人間詞話》。又或他在讀過《宋元戲曲史》後，重新檢出《人間詞話》細讀。若把胡適〈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諸文和《人間詞話》對校，可發現前後呼應之處，包括主張：不用典、不用陳言套語、不欣賞排律，兩氏見解都極爲相似。

首先，在反對用典及套語上，王、胡幾無不同。胡適〈寄陳獨秀〉論「文學革命」八事：「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陳套語。」[87]〈文學改良芻議〉改易順序爲：「五曰，務去爛調套語。六曰，不用典。」[88]這兩點，王國維《人間詞話》先已發之。請看胡適〈寄陳獨秀〉：

> 適嘗謂凡人用典或用陳套語者，大抵皆因自己無才力，不能自鑄新辭，故用古典套語，轉一灣子，含糊過去，其避難趨易，最可鄙薄！[89]

〈文學改良芻議〉文辭稍異：

> 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一一自己鑄詞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真，但求能達其狀物寫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爛調套語者，皆懶惰不肯自己鑄詞狀物者也。[90]

---

86 胡適，〈致任鴻雋〉（1916 年 7 月 26 日），收入《胡適全集》，卷 23，頁 103-105。

87 胡適，〈寄陳獨秀〉，原載《新青年》，卷 2 號 2（1916 年 10 月），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3。

88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4。

89 胡適，〈寄陳獨秀〉，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2。

90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9。

胡適認爲「狀物寫意」，須「不失其眞」；不用「爛調套語」，則須「自鑄新詞」。此兩項主張，其實只是一事之兩面。

然則王國維最先抉出一「眞」字，爲其文論的核心觀點。《人間詞話》第三則說：「豪傑之士能自樹立」。[91]第六則謂：

> 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92]

第五十六則：

>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寫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辭脫口而出，無矯揉妝束之態。以其所見者真，所知者深也。詩詞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無大誤矣。[93]

王氏此說，即胡適〈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之由來。惟王氏《宋元戲曲史》中，更舉元人曲子爲例。第十二章〈元劇之文章〉，列舉關漢卿、馬致遠、鄭光祖曲作，以爲此諸作品「眞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94]

胡、王之同，不僅在意思上；文詞上，也往往相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推崇關漢卿爲元代曲家第一人：

> 關漢卿一空倚傍，自鑄偉詞。而其言曲盡人情，字字本色，故當為元人第一。[95]

胡適則謂今人必須「自鑄新詞」。兩氏遣詞用語，簡直如出一口。更檢胡適 1916 年 4 月 6 日爲《沁園春》第三次改稿，最末幾句也帶有王國維影響的痕跡：

> 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後，倘傍人門戶，不是男兒。（末句又擬改作：

---

[91]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61。
[92]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62。
[93]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7。
[94]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1-145。
[95]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頁 149。

「從今後，待掃除陳腐，重鑄新詞。」）[96]

王國維說關漢卿「一空倚傍」，胡適則自誓「倘傍人門戶，不是男兒」。王國維謂關漢卿「字字本色」，胡適則說「但求似我，何效人為？」王國維說關漢卿「自鑄偉詞」，胡適則曰「自鑄新詞」（〈寄陳獨秀〉）、「重鑄新詞」。若說胡未見王句，令人難以置信。

又《人間詞話》批評用替代字及隸事入句，第三十四則論周邦彥、吳文英、秦觀諸家，逐一評點：

>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樓連苑」，「綉轂雕鞍」所以為東坡所譏也。[97]

第三十五則：

> 沈伯時《樂府指迷》云：「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說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臺』、『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98]

第五十七則，譏評隸事之作：

> 人能于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篇，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于此道已過半矣。[99]

王、胡反對套語，反對用典，皆如出一口。

事實上，胡、王所舉前人用典的例子，幾乎全同，只有多寡之別。〈寄陳獨秀〉論〈不用典〉，舉的例子較多：

---

96 胡適，《日記》，1916 年 4 月 16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28，頁 355。
97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0。
98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0-471。
99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7-478。

在古大家集中，其最可傳之作，皆其最不用典者也。老杜〈北征〉何等工力！然全篇不用一典。……其〈石壕〉、〈羌村〉諸詩亦然。韓退之詩亦不用典。白香山〈琵琶行〉全篇不用一典。〈長恨歌〉更長矣，僅用「傾國」、「小玉」、「雙成」三典而已。律詩之佳者，亦不用典。……總之，以用典見長之詩，絕無可傳之價值。[100]

《人間詞話》第五十八則，只舉〈長恨歌〉爲例：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只「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于此見。不獨作詩為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101]

胡、王同樣用白香山〈長恨歌〉「小玉雙成」之例，到底是心有靈犀？還是胡受王影響之跡？

惟胡、王論用典非無差異。第一、王國維以隸事與否，作爲「白吳優劣」之判準。胡適則悍然宣稱：「用典見長之詩，絕無可傳之價值。」第二、王國維後來作〈頤和園詞〉，爲仿梅村之作。[102]胡適對用典一反到底，晚年猶稱：「律詩，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的價值。」[103]

至對長律一體的看法，胡、王也接近。兩人的差別，只在王先發之，胡更激烈。〈寄陳獨秀〉聲明：

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104]

〈文學改良芻議〉「七曰不講對仗」，爲「廢駢廢律」之說：

後世文學末流，言之無物，乃以文勝；文勝之極，而駢文律詩興焉，而長律興焉。駢文律詩之中非無佳作，然佳作終鮮。所以然者何？豈

100 胡適，〈寄陳獨秀〉，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2。
101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8。
102 王國維致鈴木虎雄函（1912 年 4 月 15 日）：「前作〈頤和園詞〉一首，雖不敢上希白傅，庶幾追步梅村。蓋白傅能不使事，梅村則專以使事爲工。然梅村自有雄氣駿骨，遇白描處尤有深味」。收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頁 53。
103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 24。
104 胡適，〈寄陳獨秀〉，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3。

> 不以其束縛人之自由過甚之故耶？（長律之中，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也。）[105]

王國維雖不至「廢駢廢律」，但對排律評價不高。[106]《人間詞話》第五十九則：

> 近體詩體製，以五七言絕句為最尊，律詩次之，排律最下。蓋此體于寄興言情，兩無所當，殆有均之駢體文耳。詞中小令如絕句，長調似律詩，若長調之〈百字令〉、〈沁園春〉等，則近于排律矣。[107]

王國維稱排律爲近體詩體製之「最下者」，胡適則稱「長律之中，上下古今，無一首佳作可言」。兩人共同之點，在重質（內容）輕文（詞藻）。而胡適之說，又較王國維更見激烈。

1934 年 7 月，任訪秋撰成〈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一文，在比較兩氏觀點後指出：

> 王先生為遜清之遺老，而胡先生為新文化運動之前導，但就彼二人對文學之見地上言之，竟有出人意外之如許相同處，不能說不是一件極堪耐人尋味的事。[108]

任文發表在《中法大學月刊》第 7 卷第 3 期（1935 年 6 月 1 日），且寄胡適一閱。胡適 1935 年 7 月 26 日回函，表示從未一讀《人間詞話》：

> 論詞一文，使我很感覺興趣。靜庵先生的《人間詞話》是近年才有印本的，我在他死前竟未見過此書。他晚年和我住的相近，見面時頗多，但他從未提起此書。今讀你的比較研究，我很覺得我們的見解確有一些相同之點，所以我很高興。[109]

---

105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3-14。

106 王國維赴日後見解，見其致鈴本虎雄函（1913 年 3 月 11 日）：「此體雖不可喜，然用諸敘事亦非不可，七古中如初唐及長慶體亦屬此類。故苟能於轉折處用意，則全篇自覺有力。」收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59。

107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8。

108 任訪秋，〈王國維《人間詞話》與胡適《詞選》〉，收入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頁 73。

109 胡適，〈致任訪秋〉（1935 年 7 月 26 日），收入《胡適全集》，卷 24，頁 226。

王國維《人間詞話》在 1926 年才有樸社「印本」，卻早已有了《國粹學報》本，而且流傳頗廣。胡適之說，委實令人困惑。

當年北大師生大力鼓吹新文學之時，傅斯年在 1919 年 1 月 1 日《新潮》第 1 卷第 1 號，刊出〈出版界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提及《人間詞話》一書，備極讚賞：

> 王君治哲學，通外國語，平日論文，時有達旨。余向見其《人間詞話》，信為佳作。[110]

胡、傅過從甚密。胡適又是《新潮》顧問，且如此欣賞王氏《宋元戲曲史》。因此，傅斯年評論王書，甚至可能出自胡適建議。即使傅氏自作此文，胡適也沒有不讀之理。總之，胡適自云 1926 年前未見《人間詞話》，不盡可信。

至於王國維晚年是否未向胡適提及《人間詞話》？這倒極有可能。1925 年 8 月 29 日，海寧後學陳乃乾向王國維表示有意重印《人間詞話》，王國維態度消極。[111]黃濬《花隨人聖盦摭憶》（1934-1937 年刊布）第二十六則〈文字學術隨世俱變〉，既暗示胡適《國語文學史》（編寫於 1921 年底至 1922 年初）之說，受《人間詞話》影響，也指出王國維晚年自悔前作：

> 晚近王靜庵《人間詞話》陳義絕高，宋詞自白石以下，皆致不滿。二十餘年前，刊於《國粹學報》，余讀之覺極精闢，而隘處疑必有流弊。及適之為文學史，旨在推行國語，排斥用典，理所固然，而于〈疏影〉、〈暗香〉二詞，詆為「不成東西」，似先輸靜庵之我見，而倍為鹵莽，貽誤後生，良非淺鮮。……龍榆生為余言，靜庵先生老年悔其少作，惜未睹其晚稿也。[112]

110 傅斯年，〈出版界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卷 1，頁 113。
111 王國維，〈致陳乃乾〉（1925 年 8 月 29 日），收入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頁 563。
112 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聖盦摭憶》，上冊，頁 31。

是則黃濬也看出胡適步趨王國維之說，「而倍爲鹵莽」。據 1925 年王國維致陳乃乾函，知其晚年有「刪定」舊稿之想。或有感於早年之說流弊之大，頗欲補救之。

4. 〈詠史〉五首之三（1913）

其實，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中，還留下一絲線索，透露胡適留美時期對王國維著作的關注。[113]即在「不用典」一節中，胡適界定廣狹兩義，承認「用字簡而涵義多」爲優點。接著，他舉「用典之工者」數首，其例有五，第四首是王國維〈詠史〉五首之三：「虎狼在堂室，徙戎復何補？神州遂陸沉，百年委榛莽。寄語桓元子，莫罪王夷甫。」胡適評曰：「此亦可謂使事之工者矣。」[114]胡適引用的王國維〈詠史〉詩，作於 1913 年 2 月王氏留日之時。1913 年 5 月，王氏這一組詩被收入《壬癸集》，在日本刊行。1914 年，王作又刊《國學叢刊》第 1 卷（後收入《雪堂叢刻》）。[115]胡適在美竟得一見，頗疑是從《國學叢刊》得知。再檢 1921 年 8 月 24 日胡適日記，記當日在上海書攤購得「《壬癸集》（初刻日本本）一部」。[116]由此推測胡適在美國見到的本子，可能是一部《國學叢刊》本。

綜合來看，胡適在上海時期和留學時期讀過的王國維著作，大致包括下列幾種：《紅樓夢評論》、《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詠史〉詩。至於《國粹學報》刊載的其他王作：《戲曲考原》、《宋大曲考》、《錄曲餘談》，也可能一併參閱。因王國維著作的啓示及研究成果，大大提高了胡適對白話文學的信心。「一代有一代文學」之說，更成爲文學革命論的核心觀念。

113 本文撰成後始見季劍青文，知其也注意到「〈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到了王國維的詠史詩，說明胡適對王國維的文字頗爲留意，也不排除他曾在《東方雜誌》上看到該書〔按：指《宋元戲曲史》〕連載的可能。」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史／考》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期 6，頁 330，註 36。

114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2-13。

115 胡逢祥，〈王國維著譯年表〉，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20，頁 514。

116 胡適，《日記》，收入《胡適全集》，卷 29，頁 430。此部《壬癸集》，即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錄》第 4545 號，冊 2，頁 1458。

胡適《口述自傳》敘及「青年期逐漸領悟的治學方法」一章，曾不無得意地向唐德剛道及一件舊事，即他留學日記 1916 年 12 月 26 日條下長篇《札記》:「論訓詁之學」，其實節譯自約翰．浦格斯（John P. Postgate）教授爲《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第十一版寫的《版本學》（*Textual Criticism*）。胡適表示：

> 假如我不說出我那篇文章是上述浦文的節要，世上將無人知道，因為我那篇節要并未說明採自何書。我文中所舉的也全是中國的例子，而不是浦氏原文所舉的第一版雪萊詩集上的例子。[117]

胡適這種「未說明採自何書」的寫作方式，不僅爲其留學日記慣用之技，也見諸其公開刊布之文。當然，胡適日記是個人《札記》，毋需逐一交代思想來歷。即使〈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諸文，也非嚴格學術著作。但到了〈逼上梁山〉一文，仍無一語道及王國維，就未免有「掠美」的嫌疑。

四、新文化兩代學人的傳承和疏離

我認爲胡適作爲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對王國維的微妙態度有兩個原因：第一，胡氏素來以革命家自許，不贊同王國維「遺老」般的「非革命」乃至「反革命」態度。第二、胡適作爲新一代人的領袖，對上一代總有不自覺的挑戰心理，猶如兒子對父輩的反叛，在思想上有明拒暗用的跡象，殊不樂意公然承認上一代權威。至於王國維，他對西學持開放態度，認爲中學須推陳出新，對新文學派（新文化派）推倒古人的激烈言論，卻殊不謂然。新文化派縱有人欲尊他爲「文學革命的先驅者」，想必他也不願接受此一「榮冕」。本節略述晚清至民初兩代學人欲迎還拒的關係，包括學界中人對胡、王關係的討論，以及王國維自述對新文學的看法，以說明胡、王兩氏思想歧異之處。

---

[117]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283。

（一）王、胡繼受關係

就觀念而言，王、胡兩代人的思想繼受關係，其實尚有學界未盡明瞭之處。例如：前引胡適可能早就留意的《國學叢刊》，刊出一篇透露新氣息之〈序〉（1911 年），王國維正告讀者：

> 學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今之言學者，有新舊之爭，有中西之爭，有有用之學與無用之學之爭。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余謂中、西二學，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未有西學不興而中學能興者，亦未有中學不興而西學能興者。[118]

所謂「居今日之世，講今日之學」，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其精神一以貫之，王國維對西學的開放態度無庸置疑。他從科學觀點，以別眞僞爲標準：

> 天下之事物，……自科學上觀之，則事物必盡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凡吾智之不能通而吾心之所不能安者，雖聖賢言之有所不信焉，雖聖賢行之有所不慊焉。何則？聖賢所以別真偽也，真偽非由聖賢出也；所以明是非也，是非非由聖賢立也。[119]

從史學上觀之，卻別有所重：

> 即今日所視為不真之學說、不是之制度風俗，必有所以成立之由與其所以適于一時之故。其因存于邃古而其果及於方來，故材料之足資參考者，雖至纖悉不敢棄焉。[120]

我們不能不說，這篇〈《國學叢刊》序〉，開胡適 1922 年執筆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之先聲。

---

[118]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129、131。
[119]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130。
[120] 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130。

過去學界看重胡適執筆的北大《國學季刊》之〈發刊宣言〉，認爲蘊含了現代學術精神。例如余英時提出，此文是掀動「史學革命」，「建立新典範的正式宣言」。[121]逯耀東師也認爲，「《國學季刊》的創刊不僅是中國現代史學，更是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學術從傳統邁向現代的一面引導旗幟。」[122]胡適代表北大同人撰寫的〈發刊宣言〉之核心概念，由胡適概括爲三句話：

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範圍。

第二、用系統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

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123]

我曾指出此三句話「指出一切學術都有獨立及平等的研究價值，都具有同樣重要的地位。這一學術觀念上的革命性轉變，是中國學術由傳統轉入現代的標誌。由此開出日後無數學術研究的新天地。」[124]惟就個別學者表現而言，胡適所說的用「歷史的眼光」，「把唐詩還給唐，把詞還給五代兩宋，把小曲雜劇還給元朝，明、清的小說還給明、清。每一個時代，還它那個時代的特長的文學，然後評判它們的文學的價值。」其實與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之說，及〈《國學叢刊》序〉的史學立場，無以或異。至於「系統的整理」，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更提供了範例。最後，「比較的研究」，胡適舉文學史爲例，指出「文學史上，小說、戲曲近年忽然受學者的看重，民間俗歌近年漸漸引起學者的注意，都是和西洋文學接觸比較的功效更不消說了。」[125]在這方面，王國維也有開創之功。

121 余英時，〈《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史學革命〉，《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頁 241-253。

122 逯耀東，〈郭沫若吻了胡適之後〉，《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147-151。

123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原載《國學季刊》，卷 1 號 1（1923 年 1 月），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17。

124 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收入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548-549。更全面的論述可參考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125 胡適，〈《國學季刊》發刊宣言〉，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16。

如此看來，胡適這篇「建立新典範」，引導「中國學術從傳統邁向現代」的〈《國學季刊》發刊宣言〉，竟絲毫沒有超出王國維〈《國學叢刊》序〉所提出的主張及具體實踐。只不過一用文言，一用白話。前者影響較狹，後者廣被四方。

（二）對老一輩的競勝心理

當時已有一些細心的讀者，看出胡、王思想的繼受關係。最早爲新文學的支持者吳文祺。他是浙江海寧人，有維護鄉先輩之意。1924 年，寫〈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一文，提出「王靜庵先生二十年──或十餘年──前的文學見解，竟和二十年──或十餘年──後的新文學家不謀而合。」更尊王國維爲「文學革命的先驅者」。[126]他對新文學領袖暗用王國維之說，卻不提及其人深感不平，認爲：

> 舊文人中能澈底明白文學的真諦的，是很少的了。不料在二十年前酸化了的中國文壇裏，居然有一個獨具隻眼大聲疾呼地以小說戲曲為「文學中之頂點」的人，其見解之卓越，較之現代的新文學家，有過之，無不及，其人是誰？就是海寧王靜庵先生。[127]

他對胡適撰寫《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中，卻不給王國維一席之地，尤表憤慨。[128]的確，1922 年胡適所撰《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絕口不提王國維的貢獻，是耐人尋思的。但一年後，胡適在日譯本〈序〉中，作了一點補救。不過，這或許是由於譯者橋川時雄的提醒，而非個人主動作出的修正。

橋川時雄本人既對王國維推崇有加，也熟知日本學者對王氏的評價。1910 年 1 月，京都大學鈴木虎雄〈《曲錄》及《戲曲考原》〉刊《藝文》，是最早

[126]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合訂本（1927 年 6 月），頁 759-770。

[127]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合訂本（1927 年 6 月），頁 759。

[128] 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小說月報（中國文學研究號）》合訂本（1927 年 6 月），頁 759。

介紹王氏著作的一文。京都大學教授中最稱領袖的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也對王國維極表敬意。王國維逝世後，狩野回憶兩人相識於北京，親聞王國維議論：

> 根據王君的看法，傳統的中國文學研究以詩文為中心而忽視戲曲、小說等，這種偏見是十分荒謬的，從純文學的角度而言，戲曲、小說也與詩文一樣重要。他公然持這樣的觀點，也形諸文字。正如他所說，就元代文學而言，詩人、文學家在純文學上的造詣，可能遠不如雜劇的作者。王君開拓了此前中國學者疏忽了的研究領域。現在的中國新學者都注重中國俗文學的研究，則是受益於王君的啟示，他十幾年前就已在這方面導夫先路。[129]

狩野、王國維對戲曲小說的興趣，促使他們有很多交流，相互激發。[130]王國維寓居京都之後，對日本學界影響更大。[131]日本東西京學者對王國維開創中國俗文學研究的推崇之情，使胡適面對日本讀者時不能不補敘王國維的貢獻。

雖然如此，胡適的補敘也很簡略。1923 年 3 月 7 日，他爲橋川時雄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撰序，加上寥寥數語的說明：

> 近人對於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的賞鑒和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132]

胡適未提王國維研究小說的成績，而把整理和研究中國小說之功，歸諸北大新文化派：

> 近年我們提倡用新式標點符號印古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之類，加上歷史的考證、文學的批評，這也可算是這個時期一種小貢獻。[133]

---

129 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君〉，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20，頁 371-372。

130 近年中文世界裏有很多研究成果，參考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之第三章〈研究重心之轉移──狩野直喜致力於中國小說戲曲史研究緣起及其貢獻〉，頁 116-136；狩野直喜著，張真譯，《中國小說戲曲史》及〈譯者的話〉，頁 1-30。

131 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頁 126；張真，〈平生風義兼師友──王國維曲學研究與日本漢學關係考論〉，《戲曲研究》，輯 100，2017 年 1 月，頁 16-27。

132 胡適，〈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344。

133 胡適，〈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345。

我們不能不說，胡適內心佩服王國維之際，不免隱含一種競勝心理。戲曲研究既已讓王國維遙遙領先，他和魯迅等人只能往小說考證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考證小說上的若干成績，也曾贏得王國維肯定。《顧頡剛書信集》卷二，收錄 1922 年 4-5 月顧頡剛與王國維來往信函。[134]1922 年 5 月 29 日王國維答顧頡剛函中，有對 1921 年 12 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胡適文存》的評點：

> 頃閱胡君適之《水滸》、《紅樓》二考，犁然有當於心，其提倡白話詩文，則所未敢贊同也。[135]

胡適「提倡白話詩文」之未得王國維贊同，當在其徹底否定非白話文之作爲死文學、毫無文學價值之極端主張。

1924 年，王國維爲《觀堂集林》之〈序二〉，又借羅振玉口吻，自矜自重指出：「海內新舊學者咸推重〔王靜安〕君書無異辭。」[136]又敘述和解釋自己治學旨趣及範圍變化之原因：

> 光緒戊戌〔1898〕始與君相見於上海，時余年三十有三，君二十有二。君方治東西文字，繼又治泰西哲學。逮歲丁未〔1907〕，君有《靜庵文集》之刻。戊申〔1908〕以後，與君同客京師。君又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時則有《曲錄》之刻，而《宋元戲曲史》亦屬草於此時。然君治哲學，未嘗溺新說而廢舊聞；其治通俗文學，亦未嘗尊俚辭而薄雅故。[137]

這篇所謂「羅振玉序」，可視爲王國維對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迎頭反擊。同時，也道出他無取於新文化派的理由。因爲他認定：吸納新知，何妨尊重舊聞；

---

134 顧頡剛（下略），《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書信集》（北京：中華書局，2011），卷 2，頁 107-110。
135 王國維，〈致顧頡剛〉（1922 年 5 月 29 日），收入《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書信集》，卷 2，頁 110。
136 〈觀堂集林序二〉，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8，頁 3。這篇序文出自王國維手筆，羅振玉僅改定數語，見校者註記，頁 3。
137 〈觀堂集林序二〉，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4，頁 3-4。

研治俚辭，無礙欣賞雅故。質言之，對傳統不取「革命」的態度，是王國維雖爲新學先驅，卻終究不成爲「文學革命者」的原因。

至於王國維自認「海內新舊學者咸推重〔王靜安〕君書無異辭」，倒也事出有因。據 1922 年春王、顧來往信函，可知顧頡剛受北大師長委託，向王國維鄭重致意。此時，顧頡剛大約尙銜胡適之命，奉贈新出《胡適文存》。故此王國維才在答函中，品評胡適之作。胡、顧師生對王國維學問的推重，也反映在兩年後（1924 年）溥儀被馮玉祥部下驅逐出宮，顧頡剛向胡適建議向清華大學舉薦王國維之舉。[138]於是，有胡薦王入清華之佳話。

惟 1927 年 6 月王國維自沉後，與王國維「風義平生師友間」的陳寅恪，賦〈王觀堂先生輓詞〉（七言排律），有「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爲神州惜大儒。」兩句，[139]卻透露一點微妙的線索。蔣天樞晚年抄錄陳寅恪自注，指出詩句出處：

> 《昌黎集》〈嘲魯連子〉詩：「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嘴。」蓋王先生之入清華，胡所薦也。[140]

是則陳氏詩旨，對胡適褒中寓貶。[141]其原因當與胡氏〈寄陳獨秀〉、〈文學改良芻議〉諸文，對老輩（如陳三立）語多尖刻，很有關係。但此詩既爲「輓王國維」之作，亦當涉及胡、王思想交涉之前塵往事。我們甚至可以懷疑，與陳寅恪「風義平生師友間」的王國維，[142]或許將往事向陳寅恪親口道及。

再據吳宓《雨僧日記》1927 年 10 月 3 日條下，又透露陳寅恪與其助手浦江清之密切關係：

> 夕，陳寅恪來，以所作〈弔王靜安先生〉七古一篇見示。宓并召浦江清來，命為抄寫云。[143]

---

138 顧頡剛，〈致胡適〉（1924 年 12 月 4 日），收入《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書信集》，卷 1，頁 421-422。

139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并序〉，收入陳美延編（下略），《陳寅恪集：詩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6。

140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并序〉，收入《陳寅恪集：詩集》，頁 16。

141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上冊，頁 89-90。

142 陳寅恪，〈王觀堂先生輓詞并序〉，收入《陳寅恪集：詩集》，頁 17。

143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北京：三聯書店，1998），冊 3，頁 415。

浦江清畢業於東南大學西洋文學系，被吳宓推薦到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爲陳寅恪助教。[144]上述吳氏日記所提陳寅恪「〈弔王靜安先生〉七古一篇」，即〈王觀堂先生輓詞〉。浦江清受命鈔寫，或曾聽聞陳寅恪釋解詩旨；又或自行領悟詩意，促成一年後撰文論王、胡關係，此即〈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一文。

浦江清文發表之背景，或許也有見及胡適雖受王國維啓迪，公開文字中卻多糾駁之詞，遂有感而發。其中，1923 年 3 月胡適發表的〈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刊載於《讀書雜志》，是他論中國古典戲曲的第一篇文字，便挑剔王國維《曲錄》說：「此書出版于宣統元年，已近十四年了。這十四年中，戲曲新材料加添了不少。我們希望王先生能將此書修改一遍，於每目下注明『存』『佚』，那就更有用了。」[145]其實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小序，已說明《曲錄》等卷撰成後，「從事既久，續有所得，頗覺昔人之說與自己之書，罅漏日多。」[146]蔣星煜對胡適批評之語，頗抱不平，認爲「胡適沒有直接從事古典戲曲的作品與理論著作兩方面的目錄學、版本學和訓詁學的研究，對工作的艱苦性以及工作量的巨大缺乏估計」。[147]傅斯年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一文，則充分推崇其蓽路藍縷之功，認爲「王先生此書，取材不易，整理尤難。」[148]

總之，王國維對中國戲曲的開創性業績，得到法國、日本同行的推崇。與此同時，新文化派領袖胡適對這位先行者的承認，卻往往含糊其詞。浦江清之作，或是有感而發。

---

144 浦漢明，〈浦江清先生傳略〉，收入浦漢明、彭書麟編選，《無涯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頁 256-257。

145 胡適，〈讀王國維先生的《曲錄》〉，收入《胡適全集》，卷 2，頁 855-857。

146 王國維，〈序〉，《宋元戲曲史》，頁 1。

147 蔣星煜，〈胡適與元雜劇、明清傳奇〉，《文壇藝林滄桑錄》，頁 104。

148 傅斯年，〈出版界評：王國維著《宋元戲曲史》〉，收入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卷 1，頁 112。

（三）王、胡文學觀之根本歧異

然而，浦江清看出王、胡的絕大差異，主要仍在「革命」意識之有無強弱，而不在枝節觀點之異同。關於兩氏思想之異同，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一文，作出明銳深入的辨析。

此文寫作的背景，為王國維自沉一週年，吳宓主持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行「王靜安先生逝世週年紀念」，浦江清特撰〈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他介紹王國維文學批評之作，指出胡適在文學觀點上備受王國維影響：

> 胡氏生後於先生，而推先生之波瀾者也。……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應之、實行之。一切之論，發之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雖謂胡氏盡受先生之影響可也。然而創文學革命之論，變天下之文章而盡為白話者，胡氏也，非先生也，其故何歟？[149]

浦江清最後一問極為重要，不僅涉及王、胡兩人之思想淵源，更關係中國現代學術之判然兩途。浦江清對這一絕大問題的回覆是：「〔王〕先生始終認『古雅』在美學上有一位置也。」換一個說法，即「保守激進之不同，此先生與胡氏文學批評之意境所以迥異。而其後革古文而為白話者，所以為胡氏而非先生也。」因王氏始終承認古文詞之價值，故不但自作詩詞，且「於現代文學中尤低徊於柯蓼園之詩，況夔笙之詞也，以視世之遺棄一切現代詩詞而於古人中全不見老杜，但知有元稹、白居易者有間矣。」[150]

當時浦江清一文，針對的正是胡適及其追隨者。幾年後陳寅恪向胡適推薦浦江清從事翻譯，給予浦江清很高的評價。此函寫於 1931 年 2 月 7 日，雖僅簡短數語，卻直承陳、浦關係密切：

> 浦君本專學西洋文學，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學極有修養，白話文亦流利，……弟與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151]

---

149 穀永（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3，第 9 版。
150 穀永（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3，第 9 版。
151 陳寅恪，〈致胡適〉（1931 年 2 月 7 日），收入陳美延編，《陳寅恪集：書信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135-136。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和浦漢明〈浦江清先生傳略〉，可以證明陳、浦交誼。[152] 我們似乎可以推想，浦江清論王國維文學批評之作，或者含有陳寅恪的意見。而胡適對浦文的反應，則間接反映於浦江清投稿及主持之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結束時，胡適 1933 年底日記痛罵「此是『學衡』一班人的餘孽，其實不成個東西」，[153]略知其中消息。

又關於王、胡兩氏「保守激進之不同」，陳平原比較過胡適與前輩之文學理論，明快揭出新文學運動領袖特異之處，在胡適爲進步史觀支配：

> 提倡文學革命時，胡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重讀中國文學史，得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結論。拆開來看，這結論並新鮮，劉勰已有「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的斷語（《文心雕龍》），焦循則明言一代文學有一代文學之勝（《易餘籥錄》），王國維說得更絕：「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得繼焉者也。」胡適的結論之所以石破天驚，就在於其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之「歷史的見解」中，摻進了「進化」的價值判斷。不只是文學隨時代而變遷，故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胡適強調的是兩千年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不曾停滯也不曾倒退，而是始終在發展進步。……「唐朝的詩一變而為宋詞，再變而為元明的曲，都是進步。」這種植根於達爾文和斯賓塞理論的文學進化觀，在 19 世紀的西方曾經風行一時。[154]

相較之下，王國維不持這種進步觀。而且，就一種文體而言，更有「始盛終衰」之說。此論爲胡適所無，後來在傅斯年提示下，胡適才有「每一種文學都經過一種生老病死的狀態」之見解，[155]轉爲接近王國維之看法。

---

[152] 傅斯年對浦江清的器重，也值得注意。參考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 44。

[153] 胡適，《日記》，1933 年 12 月 31 日條下，收入《胡適全集》，卷 32，頁 254。

[154] 陳平原，〈胡適的文學史研究〉，收入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頁 235。

[155] 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34-336。

王國維考察詞曲之演進，形成文體退化之說。王國維《人間詞話》第五十四則，略論古今詩體之流變：

> 四言敝而有《楚辭》，《楚辭》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詩敝而有律絕，律絕敝而有詞。蓋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一切文體所以始盛（中）〔終〕衰者，皆由於此。故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體論，則此說固無以易也。[156]

陳鴻祥據此以為「在王國維看來，文學的發展，應該是後來居上，而決非『後不如前』。」[157]所說與王氏不合。季劍青指出王氏此說「未明言後必勝於前」，近代許多論者往往把此說「視為某種文學進化論的表述」，「不能不說是一種誤讀」。[158]此前則浦江清所做概括，確能準確把握住王國維意思：「先生之統論歷代文學也，持古今有相同價值之論；而就文學之一體而言，則頗持後不如前之說。」[159]

概括來說，王國維「一代有一代之文學」這一著名論斷，包含了兩個層次：第一、文學變遷說，一代有一代之所勝。或用今語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代表文學，莫謂文學後不如前。第二、文體始盛終衰說。即就一種文體論，往往呈現退化跡象，絕非始終進步。

關於前一層次，即一代有一代之所勝。這一見解使王國維的論著，展現一種開拓性氣魄。反對昔人認為「後不如前」、或「今不如古」之見。浦江清指出王氏此說的突破性：

> 夫好模古以自高者，吾國文人之通病也。而自來評論文學者，亦未有不持今不如古之論。……先生深知其非，故為真不真之論，以明無古人之感而徒襲古人之貌者，無當於文學。……昔德人希勒 Schiller 惡世

156 王國維，《人間詞話》，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1，頁 476-477。
157 陳鴻祥，《王國維傳》，頁 339。
158 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史／考》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期 6，頁 330-332。
159 縠永（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3，第 9 版。

> 人但知模〔膜〕拜希臘拉丁文學而蔑視近代文學也，創 Naïve poetry and sentimental poetry 之論，提高近代文學之位置，謂至少當與古代文學同其價值。若先生者，殆吾國之希勒歟！[160]

浦江清以王國維擬德國席勒（希勒），有其一定的道理。就王國維自覺地闡述且實踐這一認識而言，他的確爲中國學界注入一股新氣息。

至於王國維論韻文蛻變之說，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推而廣之，包含對「文」和「韻文」之演變歷程，都提出了完整論述：

>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各因時勢風會而變，各有其特長，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161]

王國維說「謂文學後不如前，余未敢信」；胡適卻聰明地轉爲「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兩人之意，亦無二致。此時，胡適雖有「歷史進化（進步）」觀，卻未露太多痕跡。然而，正如羅志田看出，胡適「認爲後一時代的文學通常勝過前一時代的。」[162]其說和王國維根本有異。但這樣一種觀念，在胡氏 1918 年〈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中，成爲一個主要觀點，支配了他對元代和明清戲劇的評價，和王國維距離越來越遠。[163]

關於第二個層次，王國維持文體「始盛終衰」之論，認爲元曲勝明清戲曲。日本學者青木正兒欲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研究明清戲劇，就在王氏那裡碰了釘子。他說大正十四年四月到清華大學拜訪王國維，王氏斬釘截鐵地說：

> 明以後的戲曲沒什麼意思。元曲是活的，明以後的戲曲是死的。[164]

---

160 穀永（浦江清），〈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大公報・文學副刊》（天津），期 23，第 9 版。

161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6。

162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11。

163 季劍青對王、胡文學史觀之異同，作了精采辨析。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史／考》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期 6，頁 329-333。

164 青木正兒，〈王先生的辮子〉，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20，頁 387。

王氏「死」、「活」之說，竟用上了新文學派語彙。當時王國維對青木正兒的冷淡，或許是知其傾向新文學之故。惟其對元曲和明清戲曲的評價，則爲「始盛終衰」之一貫見解。

但從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來看，他認爲明清戲曲較元代進步。歸功於體裁的解放：

> 〔元人〕雜劇的限制太嚴，故除一二大家之外，多止能鋪敘事實，不能有曲折詳細的寫生工夫；所寫人物，往往毫無生氣；所寫生活與人情，往往缺乏細膩體會的工夫。後來的傳奇，因為體裁更自由了，故於寫生，寫物，言情各方面都大有進步。[165]

他認爲元雜劇不如明傳奇，其說已異於王國維。從表面上看，胡適是基於文學的內在表現，以評斷作品價值高下。其實影響他最深刻的，仍是那深入骨髓的「進化」觀。1918 年胡適講〈短篇小說〉，爲文學「進步」作出定義：

> 《水滸》所以比《史記》更好，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水滸》所以比《宣和遺事》更好，也只在多了許多瑣屑細節。[166]

在胡適看來，「由略而詳」，「由粗枝大葉而瑣屑細節」，是文學「進步」之標誌。這一說法在胡適追隨者的著作中，被進一步推而廣之。

然而，新文學派之「進化」論說，在錢鍾書筆下遭受根本挑戰。1934 年錢鍾書評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167]把火力集中「文學進化」一觀念，緊追不放一個基本問題：

> 「文學進化」是否就等於「事實進化」？「事實進化」祇指着由簡而繁，從單純而變到錯綜，像斯賓塞所說。「文學進化」似乎在「事實」描寫外更包含一個價值判斷：「文學進化」不僅指（甲）後來的文學作品比先起的文學作品內容上來得複雜，結構上來得細密；並且指（乙）

165 胡適，〈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40。
166 胡適，〈論短篇小說〉，收入《胡適全集》，卷 1，頁 134。
167 郭紹虞原請胡適爲《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作序，但胡適序文對若干觀點有所批評，兩人商定郭書不收此序，把部分觀點納入〈自序〉中。參見胡適，〈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序〉，收入《胡適全集》，卷 12，頁 234-236。

> 後來的文學作品比先起的文學作品價值上來得好，能引起更大或更高的美感。這兩個意義是要分清楚的，雖然有「歷史觀念」的批判家常常把他們攪在一起。（甲）是文學史的問題，譬如怎樣詞會出於樂府，小說會出於評話等等；（乙）纔屬於文學批評的範圍。承認意義（甲）文體的更變並不就承認意義（乙）文格的增進；反過來說，否認（乙）並不就否認（甲）。「後來居上」這句話至少在價值論裏是難說的。[168]

他更指出：

> 即使退一步專就「歷史事實」而論，對於「進化」兩字也得斟酌。「進化」包含著目標（destination or telos）；除非我們能確定知道事物所趨向的最後目標，我們不能倉卒地把一切轉變認為「進化」。……在無窮盡、難捉摸的歷史演變裏，依照自己的好惡來定「順流」、「逆流」的標準，……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歷史觀。[169]

新文學派從胡適開始最喜歡說的「文學進化」，在這裡受到根本的挑戰。錢鍾書提醒讀者：「即使對天演極抱樂觀的生物學家像 Julian Huxley，對于文明的進步極抱樂觀的史學家像 J. B. Bury 都不敢確定天演的目標」。「若照 Krutch: *Modern Temper* 及 Sainsbury: *Theory of Polarity* 說來，則天演簡直是一幕悲劇的開演了。」[170]

概括言之，王、胡的關鍵差異，在他們對「文學進化觀」持不同見解。正因觀點截然有異，胡氏縱然在個別觀點上沿襲王說，兩氏又先後都受到西人文學、美學觀念啓發，卻不能被劃入同一學脈中。

---

168 錢鍾書，〈論復古〉，《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頁 121。
169 錢鍾書，〈論復古〉，《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頁 121-122。
170 錢鍾書，〈論復古〉，《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頁 122。

五、結　論

1919 年，王國維撰〈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是一篇論學術與世變之大文字。他以「歷史的眼光」指出：「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171]更探測未來途徑：

> 今者時勢又劇變矣，學術之必變，蓋不待言。世之言學者輒悵悵無所歸，顧莫不推嘉興沈先生，以為亭林、東原、竹汀者儔也。……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172]

王氏此文之關鍵詞，端在一個「變」字。其所謂「變」，即胡適喜言之「革命」。然而，王氏所重在「繼承前哲」，後始「開創來學」，絕非一概推倒之自我作古。

1934 年陳寅恪作〈《王國維先生遺書》序〉，深體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之旨，歸納總結王國維的學問，尊爲近代中國學界第一人，以爲：

> 自昔大師巨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託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173]

171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十九〈綴林一〉，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8，頁 618。
172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卷十九〈綴林一〉，收入《王國維全集》，卷 8，頁 619-620。
173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收入《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頁 247。

陳氏晚年〈對科學院的答覆〉中，猶言：「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174]二十世紀初漢學泰斗伯希和在王國維逝世後，對王國維一生所做的蓋棺定論，也和陳寅恪相合：

> 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如此豐富的博學者。……王國維為中國小說和戲劇的科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在這一領域——他在所有領域裏都一樣——開創并經歷了嶄新的路程。[175]

對照 1984 年 12 月 17 日在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誕辰紀念演講上，楊聯陞追述伯希和與胡適在哈佛大學一次晤面，對胡適「並未表示多少敬意」，[176]或可視爲其尖刻的「書評」之另一種形式。

總之，終胡適一生，他亟盼成爲一個革命者。發動一場「哥白尼的思想革命」，是他的畢生夢想。也就是說，他有一股強烈願望，必欲成爲中國現代學術的奠基者。這一開創地位，絕不願拱手讓人。就專業領域來說，世人多承認胡適在小說考證上的成就。胡適《口述自傳》也用了整整一章，講述他個人對整理小說的貢獻，用「哥白尼革命」（Nicolaus Copernicus）一詞，以自概括其事業。[177]然而，這一「價值重估」的工作，王國維早已導夫先路。至於推廣研治經史之學，以治一切學問，則不但見諸王國維言論，也見諸他的研究成果。如果王國維早已倡導且實踐這一條新路，那麼我們或竟要說：引導中國學術走向現代的，是貌似遺老而實開闢新徑的王國維。[178]

---

174 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收入陳美延編，《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頁 463。

175 伯希和著，羅湉譯，〈王國維〉，收入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頁 416。

176 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頁 143。

177 胡適口述，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收入《胡適全集》，卷 18，頁 420。

178 王國維和現代中國學術典範的建立，非一文可了，需一部書稿詳加闡述。本人認爲對此問題的討論，應從學術創見、學術社群、學術評價三者之連動關係，作一整體探析。本人已刊的若干研究成果，可參見陳以愛，〈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爲中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13），下冊，頁 833-878；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105-123。

徵引書目

一、報紙期刊

《小說月報》，1927。

《大公報》（天津），1928。

二、專著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上海：上海三聯書店據上海商務印書館 1915 年版複製，2014。

王國維撰，馬美信疏證，《宋元戲曲史疏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王瑤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

北京大學圖書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錄》，冊 1-2，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江勇振，《舍我其誰：胡適．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

吳宓著，吳學昭整理，《吳宓日記》，冊 3，北京：三聯書店，1998。

周一平、沈茶英，《中西文化交匯與王國維學術成就》，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卷 1-2、12、18、23-24、27-29、3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房鑫亮編校，《王國維書信日記》，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

姚柯夫編，《〈人間詞話〉及評論匯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

狩野直喜著，張真譯，《中國小說戲曲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增訂本）》，上冊，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

胡適編選，《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據上海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 1935 年版影印，2003。

孫玉明，《日本紅學史稿》，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

浦江清，《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1999。

浦漢明、彭書麟編選，《無涯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5。

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

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陳鴻祥，《王國維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逯耀東，《胡適與當代史學家》，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黃仕忠、金文京、喬秀岩編，《日本所藏稀見中國戲曲文獻叢刊》，輯 1，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黃濬著，李吉奎整理，《花隨人聖盦摭憶》，北京：中華書局，2008。
楊聯陞著，蔣力編，《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董康著，傅杰點校，《書舶庸譚》，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卷 1，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蔣星煜，《文壇藝林滄桑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2。
錢鍾書，《錢鍾書集：寫在人生邊上‧人生邊上的邊上‧石語》，北京：三聯書店，2001。
錢鍾書，《錢鍾書集：談藝錄（補訂重排本）》，北京：三聯書店，2001。
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羅志田，《再造文明的嘗試：胡適傳（1891-1929）》，北京：中華書局，2006。
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20 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
羅崗、陳春艷編，《梅光迪文錄》，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
顧頡剛，《顧頡剛全集：顧頡剛書信集》，卷 1、2，北京：中華書局，2011。
Cordier, Henri. *Bibliotheca Sinica, Volume Ⅲ*.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éricaine, 1906-1907.
Giles, Herbert A.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1.

三、論文及專文

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頁 334-342。
季劍青，〈被「誤讀」的經典：《宋元戲曲史／考》的形成與接受──兼論王國維治學路向的內在統一性〉，《中國文學學報》，期 6，2015 年 12 月，頁 325-344。
段江麗，〈日本「中國文學史」中的《紅樓夢》（一）──以笹川種郎爲中心〉，《紅樓夢學刊》，輯 6，2013 年 11 月，頁 226-240。
張真，〈平生風義兼師友──王國維曲學研究與日本漢學關係考論〉，《戲曲研究》，輯 100，2017 年 1 月，頁 4-28。
張真，〈譯者的話〉，收入狩野直喜著、張真譯，《中國小說戲曲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頁 1-30。
陳以愛，〈《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一份新國學的研究綱領〉，收入黃清連編，《結網編》，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 519-571。
陳以愛，〈胡適對王國維「古史新證」的回應〉，《歷史研究》，2008 年第 6 期，頁 105-123。
陳以愛，〈從疑古到重建的轉折──以王國維對傅斯年的影響爲中心〉，收入吳淑鳳等編，《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臺北：國史館，2013，頁 833-878。

陳受頤，〈十八世紀歐洲文學裡的《趙氏孤兒》〉，《嶺南學報》，卷 1 期 1，1929 年 12 月，頁 114-146。
黃仕忠，〈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再評價〉，《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總期 16，2010 年 12 月，頁 251-264。
黃仕忠，〈從森槐南、幸田露伴、笹川臨風到王國維——日本明治時期（1869-1912）的中國戲曲研究考察〉，《戲劇研究》，期 4，2009 年 7 月，頁 155-194。

Wang Guowei and Hu Shi on Literary Revolution

Joseffin Sae-Chen*

Abstract

This study traces the origins of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which claimed every generation has its own literature.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two leading figures in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Wang Guowei and Hu Shi, it contrasts the conceptual acceptance and alienation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of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compares the literary concepts of Wang and Hu, who had close academic relations, in detail. First, it explores how scholars of Europe and Japan influenced Wang. Second, it examines the dissemination of Wang's works and points out that Wang inspired Hu when the latter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u discover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in Song and Yuan, which greatly increased his confidence in the literary revolution. However, Hu was reluctant to publicly acknowledge Wang's influence. As a result, Wang's contribution to the New Literature Movement has never been adequately noted. In fact, Wang had already demonstrated the spirit of modern scholarshi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concepts from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and scholarship. Due to his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Wang wa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foremost Chinese scholar of his day by foreign scholars. However, the youth accepted Hu's "Copernican Revolution" and moved away from Wang's "carrying on the past heritage and opening up the future." Confidence in "catching up from behind" became the main theme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Keywords: Wang Guowei, Hu Shi, Literature Revolution, genealogy of the New Literature, modern scholarship

*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Tunghai University